

习语品读

习近平主席引经据典话亚太合作

编者按：11月13日至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或主持历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多个场合引经据典，为亚太合作贡献“中国智慧”。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我们要秉持亚太经合组织初心，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推动亚太合作再出发。

——习近平2023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

中国古人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新形势下，我们要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再创亚太合作新辉煌。

——习近平2022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慎其先。”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有关部门正完善落实反垄断法规，加强对国内部分行业监管。这既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惯常做法。

——习近平2021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智者顺时而谋。”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

——习近平2018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古人说：“口言之，身必行之。”实现亚太更大发展，需要每个成员脚踏实地拿出行动。

——习近平2017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亚太发展到今天，每迈出一步都要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改革创新是好事，也是难事。中国古语说：“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拉美谚语说，“没有比缺乏意志更大的困难”。

——习近平2016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任何蓝图都不会自动变为现实，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亚太各成员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习近平2015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中国古代先贤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人不能没有理想，合作不能缺少方向。亚太合作要面向未来、引领未来，谋划大手笔、塑造大格局。

——习近平2015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要采取行动，把共识转化为成果。“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习近平2015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成群的大雁来到这里，雁栖湖因此得名。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就好比21只大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今天，我们聚首雁栖湖，目的就是加强合作、展翅齐飞，书写亚太发展新愿景。

——习近平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始终积极支持和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任何有利于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机制安排都持开放态度。

——习近平2013年在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接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媒体联合采访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亚太是我们共同发展的空间，我们都是亚太这片大海中前行的风帆。亚太未来发展攸关亚太经合组织每个成员的利益。

——习近平2013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来源：新华社）

理论导读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二十大上郑重告诫全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提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其中明确“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这是我们党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充分体现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坚定的战略自信。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一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挑战考验也前所未有，对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和精神状态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机活力、关系事业兴衰成败。只有下大气力解决这些难题，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引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强国课堂

中共各级“一把手”为何被称为“书记”？

“书记”一直都是中国民众最常听到的高频词之一。这一对中共各级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称谓，已成为中共的显著标识。

在中共历史上，这个称谓从何开始？又为何如此称呼？

回看党史，党内“书记”之称始于1921年中共一大。当时，鉴于党员数量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会议选举出三人组成的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1925年四大时，中共首次称最高领导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当时的党章规定看，总书记的职责是总理全国党务。

此后，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组织都实行书记制，主要负责人以“书记”称呼。

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中央“书记处”首次成立。那时，全国各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30万人，党员达30万人，仅设总书记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此后，这一机构曾经在1966年8月停止工作，直至1980年恢复设立，目前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为何称“书记”？从目前的党史研究看，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使用这一称谓是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共产主义组织负责人称呼进行讨论，马克思主张称“书记”。在当时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经过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清醒认识到，党内政治生态尚未彻底净化，错误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制度规范尚不完善，防范“围猎”办法不多，一些部门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不力，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铲除。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着眼防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指出了新征程上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最为紧迫、最为要害、最为根本的大问题。只有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才能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取得全面从严治党的更大战略成果，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全面从严治党的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推动百年大党在不断解决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焕发蓬勃生机，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中共各级“一把手”为何被称为“书记”？

的欧洲，书记一职是指事务级、办事级勤务员。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赞同马、恩主张，称党的负责人为书记，表明要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二是从中国当时的语言习惯出发。中共一大时，办理文书及缮写工作的人员被称为书记，是最小的官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秘书。那时，初具雏形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与旧社会决裂、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矢志决不当官僚、决不做欺压百姓的“官老爷”，所以选择最小的“书记”来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最高领导。

这两种观点或许各有渊源，但它们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

当时，习近平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在这一点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

从中共成立的1921年开始，中共对干部的要求和对自我的认知始终没有变——“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它们已然刻进中国共产党的基因。

（来源：中国新闻网）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新名片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主要承担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人物、重大事件有关实物、资料征集、保管、研究和宣传展示等工作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由原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于2014年7月合并组建而成。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区内有鲁迅旧居及鲁迅陈列展览。鲁迅旧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迅于1923年秋购入，次年改建完成入住，也是迄今在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鲁迅居所。鲁迅在此生活两年多，在这里写下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篇章。1947年，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病逝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平高等法院查封了旧居，将其暗中保护起来。1949年10月19日，时值鲁迅逝世13周年之际，旧居正式对外开放。次年3月，许广平先生将旧居和鲁迅生前的藏书、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1954年初，在旧居旁建立了陈列厅，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正式建馆并对外开放。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区是依托北京大学原红楼建立的旧址类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综合性纪念馆。北大红楼原为北京大学第一院，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全楼以红砖红瓦建成，俗称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发源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活动地，北大红楼于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28日，纪念馆正式开放，比较全面地展示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毛泽东等在红楼工作时的情景，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红楼历史氛围。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秉承宣传和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的宗旨，不断推出各种形式的展览，向青少年进行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来源：北京鲁迅博物馆）

短评·总书记的改革论

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要求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平等保护全体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推动，改革的深化要求法治保障。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利益关系和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以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行为，发挥好法治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应做到同频共振、相互促进。法治建设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要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以改革的思路 and 办法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

环节体制机制，解决好法治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好维护公平正义、护航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需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方面的积极作用，用法治突破改革梗阻，确保改革落实，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要紧紧围绕“人民”二字展开。我们党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法治和改革统一并落脚于人民，这就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建设和改革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从法律上推动各项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改革举措和任务要求落地生根。（来源：新华社）

红色记忆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江西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完毕。次日，红军分别从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国民党军队在红军西进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剿灭”中央红军。其中，第一道封锁线由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负责，主要设置在江西境内，位于中央苏区西南的信丰、安远、南康、赣县一带，封锁线是一条以桃江(信丰河)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250里，东西宽约100里的弧形封锁线。粤军在这条封锁线上布置4万多兵力，构筑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铁丝网、深沟、暗堡三层防御工事，并把部分靖卫团、“铲共团”推到防线最前沿。陈济棠向蒋介石吹嘘他的防线“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扬言“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蒋介石得知陈济棠的详细部署后，十分得意地对身边的高级幕僚说道：“看来共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

之间，已成被动之局。”

陈济棠作为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一直存在矛盾，曾三次通电反蒋。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打算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地方军阀势力。陈济棠对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洞若观火，在与红军交手中也明白红军有着强大战斗力。陈济棠希望用中央苏区的红军作为隔断蒋介石的中央军渗透到广东的一道屏障。为此，陈济棠在派兵部署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一方面摆出要与红军决战的架势，另一方面又暗地里派人与红军接触，搞“外打内通”“明打暗和”。

1934年7月，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双方关系。9月，陈济棠又派人送信给中革军委，表示愿与红军谈判。红军此时正在寻找战略转移的突破口。朱德、周恩来认真分析形势，认为这是一个确定突围方向的好机会，便决定以朱德名义复信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与他们举行秘密谈判。10月初，

中央红军如何智破第一道封锁线

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携带朱德的亲笔介绍信前往寻乌县罗塘镇，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了3天3夜的秘密谈判，最后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谈判即将结束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对方谈判代表很敏感，问何长工：“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反应极快，马上平静地回答说：“不是，这是祝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其实，这是何长工与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谈判结束后，何长工、潘汉年立即返回，向周恩来详细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将对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红八军团为右路，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在越过第一道封锁线时，

红军领导机关虽然将红军“借道”行动通知了陈济棠，但粤军还没来得及下达给前沿部队。因此，双方仍展开了激烈战斗。上午10时，当红三军团红四师向新田百石村摸索前进时，被百石守敌信丰的“铲共团”常备第二中队发现，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就此打响。在红四师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指挥下，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中央红军随后取得新田圩、金鸡圩、古陂、石背等战斗的胜利，红军六战六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粤军前方部队在得到陈济棠示意后，陆续撤出封锁线，让出了20公里宽的中间大道，让红军通过。10月25日，中央红军经过前期战斗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以折兵3700余人的代价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10月30日，中央红军离开大余县境，由大余横江，左拔一线进入崇义县，翻越大山，向湖南进军，踏上了更为艰辛而漫长的长征路。（来源：学习强国）